

## 《管子集校》叙录\*

郭沫若

### (一)

《管子》书号称难读，经历年代久远，古写本已不可复见。(注一)简篇错乱，文字夺误，不易董理。

唐中宗神龙年间国子博士尹知章曾为之注(见《新唐书·艺文志》丙部及《宋史·艺文志》四)，有筌路蓝缕之功。其注亦有存佚，《文献通考》引《崇文总目》云“按吴兢《书目》凡三十卷，今存十九卷，自《形势解篇》而下十一卷，亡”。(今本《崇文总目》无此语。)今考诸解均无注，其《轻重篇》之偶有注者，盖幸存者也。注文夺误甚多，且每被人窜改。其最受人诟病者，如《大匡篇》“兄与我齐国之政”，“兄”本读为况，而注乃谓“召忽称管仲为兄”。然据刘绩《补注》引“别本注”，则并无此语。(注二)藉此可知今存尹注已非尹氏之旧。

顾尹氏之不幸尚不仅此，以其姓名不著，“尹知章”三字自唐以来已被坊间窜改为“房玄龄”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杜佑《管氏指要》序云‘唐房玄龄注’。其书载管仲将没对桓公之语，疑后人续之。而注颇浅陋，恐非玄龄。或云尹知章也”。王应麟《玉海》卷五十三亦云“唐杜佑抄《管子》书为《指略》，序称房乔所注，而旧录皆作尹知章，文句无复小异”。《唐志》及吴兢《书目》均有尹注而房无注，则或说得之。

杜佑有《管氏指略》十篇，见《新唐书》及《宋史·艺文志》。丁度亦曾为《管子要略》五篇，见《宋史·艺文志》及王应麟《玉海》。二书均已失传。然杜佑《指略》既系“抄《管子》书”

而成，则丁度《要略》殆亦出于抄纂耳。

### (二)

《管子》板本，今所能见者，以宋杨忱本为最古。此书原本今藏北京图书馆，有前清光绪五年张瑛影刻本及涵芬楼影印本传世。然影刻、影印均不免时有讹误，盖前者出于摹写之误，而后者则出于修饰之误也。

宋刻另有墨宝堂蔡潜道本者，清代学者，如孙星衍、黄丕烈、戴望均曾见之，其书已不知去向。

杨忱本载有张嶠《读管子》，文中有“绍兴己未”，即宋高宗绍兴九年(公元一一三九年)，而杨忱序题记“大宋甲申”。考绍兴己未之后，宋孝宗隆兴二年(公元一一六四年)为甲申，宋宁宗嘉定十七年(公元一二二四年)为甲申，再次一甲申则为元世祖二十一年，南宋之亡已五年矣。此只题“大宋”而不题年号，当为元世祖二十一年之“甲申”无疑。序中特尊重王攘夷之义，正寓有亡国之痛。书盖开刻于宋亡之前，而序则草成于宋亡之后，仍目为“宋本”，固无不可。

### (三)

刘绩《补注》，赵用贤称为“简明贯穿，多所发明”，颇为公允。然关于刘之年代则大有问题。明刻《管子》，如朱东光“中都四子”本，注者姓名“芦泉刘绩”与“临菑房玄龄”并列，以为唐人。卷首《管子题辞》云“唐房氏有注，刘绩为之补；自宋人削去，鲜有刻本”。赵用贤“管韩合刻”，其《管子凡例》

亦云“《管子》注出房玄龄，或云出唐国子博士尹知章。芦泉刘氏绩间为补定，第宋本俱不载”。视此可知朱赵均以刘为宋以前人。

考刘绩此名，于史可考者共有四人。一在刘宋时，自不在此限。一为辽人，辽圣宗开泰元年（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公元一〇一二年）曾官吏部尚书（见《辽史·百官志》）。一为元明间人，著有《霏雪录》，《河南通志》（卷六十五）以为元洛阳人，《浙江通志》（卷一百九十三）引《列朝诗集传》则以为“明山阴人，字孟熙，教授田里，不干仕进，家贫转徙无常，所至榜卖文榜于门，人称西江先生”。又其一为明弘治三年进士，为江夏人，其所著《春秋左传类解》刊于嘉靖年间，书中言明作于弘治年代，然亦标署“芦泉刘绩”。清代学者多认为著《管子补注》之刘绩即此弘治年间之刘绩，与明人所见不同。

考朱东光“中都四子”本刊行于明神宗万历七年己卯（公元一五七九年），上距明孝宗最末一年弘治十八年（公元一五〇五年）相隔仅七十四年。赵用贤“管韩合刻”本刊行于万历十年壬午（公元一五八二年），相隔亦仅七十七年。刘绩为弘治进士，不必即死于弘治年间，刘、朱、赵并可能并世。年代如此接近，朱、赵何至如彼无知，竟误以本朝弘治进士为宋以前人，乃至唐人耶？

又考朱熹《仪礼经传通解》所收《弟子职》一篇，自言“此《管子》之全篇，今分章句，参以众说，补其注文”，其所补注文却往往杂引尹注、刘注而混合之。庄述祖《弟子职集解序》有见及此，言“朱子所采旧注，间有与世所传刘绩《补注》同者，不能剔出”。如补注《管子》之刘绩果为明弘治间人，则南宋之朱熹何由采及其《补注》？由此可见，刘绩之注如非剿袭前人，则此一刘绩必非弘治年间之彼一刘绩。参以朱、赵之说，宜以后解为近是。

余谓补注《管子》者当即辽人刘绩。（注三）然所可异者，今所见明刻刘绩《补注》本及朱东光“中都四子”本均标署“芦泉刘绩”，

赵用贤亦云然，与弘治年间著《春秋左传类解》者之标署“芦泉刘绩”者全同。芦泉当地名，无可考。（《四库提要》以“芦泉”为弘治刘绩之号，盖以臆断。）弘治刘绩为江夏人，则《春秋左传类解》亦署为“芦泉刘绩”者，盖出于坊间书贾之误，误以辽人刘绩籍贯为弘治刘绩籍贯也。

日本宽政年间（当前清嘉庆年代）学者猪饲彦博著《管子补正》亦认刘绩为明人。其说云“检唐宋书目不见刘绩增注，近得刘绩补注《淮南子》，注中有山东青州府、顺天府昌平县等地名，乃知刘绩是明人”。此刘绩补注之《淮南子》余所未见，但刘绩既有数人，大都能著书立说，则此补注《淮南子》者与补注《管子》者不必即是一人。

#### （四）

刘绩《补注》，北京图书馆藏有一部，乃海源阁旧藏，经清代陆贻典据杨忱本反复勘校，又经黄丕烈据蔡潜道本覆校。陆校朱书，黄校墨书，唯黄校未竣事，仅毕第五卷而止。此书颇可宝贵，唯惜书前无序录，不知其刊刻年代。前人或以为“宋本”（书中多有“宋本”二字小形椭圆印章），或以为元板（见《持静斋书目》），或以为“明成化刊本”（见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及《韶宋楼藏书志》）。书用黄棉纸印，刻印颇粗率，多用简笔字（注四），显系几经翻刻，字颇走样。北京图书馆别藏明抄本刘绩《管子补注》一部，即据黄棉纸本抄录，原刻错字间加改正，而书前亦无序录。据余推测，此黄棉纸本断非刘氏原刻，盖如为刘氏原刻，则刘氏著书不致毫无序记。书中有辽讳、金讳、宋讳（注五），盖因辽人著书入金翻刻，金本入宋再被翻刻，金人或宋人翻刻时出于敌忾而剔去其序记耳。其辽讳、金讳之幸存者当是回改未尽。

朱东光“中都四子”本所根据者即为黄

棉纸刘绩《补注》本，其字句夺误几乎全同。最可注意者，如《心术·下篇》“节怒莫若乐”句，“节”字刘本误刻为小字，混入上句注文，而朱本亦如是。

余曾得一无注古本，半叶十行，行二十一字，卷首有缺，无题记目录，不知何时刊印。举与安井衡《管子纂诂》所据日本昌平学所藏无注“古本”相校，内容不异。纸质颇佳，乃所谓“麻纸”。莫友芝《宋元旧本经眼录》有“《管子》无注本，半叶十行，行二十一字，似元明间刻”，当即此本之见诸著录者。

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藏安正书堂《管子》（注六）乃此本之翻刻，其第二十四卷末叶有“太岁癸巳孟春安正书堂重刊”十二字木牌墨记（参看插图第二）。举以相校，仅字画较细为异。第一卷第五叶中缝下有一“谢”字乃原板刻工姓氏，亦复存在。唯古本有夺字待刻未补而遗留墨印处，在安正书堂本则为空白（参看插图第三），示于刻板中已剗去其字位而无待刻之意，即此已可见板之先后。

上举安正书堂本有冒广生跋语，据云“安正书堂为刘宗器书林之堂名，其家所刻书见箸录者，最早为宏治甲子之《针灸资生经》七卷，最晚为万历辛亥之《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大全》一百二十五卷，盖世其业者百余年矣。癸巳为嘉靖十二年，前一年壬辰，有安正堂刻刘可达编《璧水群英待问会元选要》八十二卷。万历二十一年亦为癸巳，前一年壬辰，有安正堂刻秦观《淮海集》四十卷，《后集》六卷。此‘癸巳’不知为嘉靖，为万历”。

冒氏对安正书堂之考察颇为详核。然此“癸巳”尚无法断言其非宏治前明宪宗成化九年（公元一四七三）之癸巳。（万历后之癸巳已为清世祖顺治十年，自当除外。）安正书堂既以无墨记本为底本而“重刊”，则此底本在当时必已视为难得之古本，莫友芝以为“似元明间刻”，不为无据。经仔细校

对，发现此本与朱东光本均同出于刘本。三本夺误既几乎全同，如上举“节怒莫若乐”句，在此本则“节”字夺去。盖因削去注文，故此误窜入注文中之“节”字亦被削去也。此例尚多，凡刘本中正文误同注文之小字在此本中均被削去。以此无注本之古朴，亦足证黄棉纸刘绩本或其底本不当出于弘治或其后。

要之，此刘本、无注古本、朱本为一系统，所出母本与杨忱本不同。精审处虽不如杨本（杨本乃经张嶠校正者），然亦有所存字句较杨本为优者。

## （五）

赵用贤“管韩合刻”本《管子》部分则以杨忱本为其母本者也。其自序云“余行求古善本，庶几遇之者几二十年，始得之友人秦汝立氏，其大章谨完整，而句字复多纒错，乃为正其脱误者逾三万言，而阙其疑不可考者尚十之二”。赵刻确较精核，在明刻本中最为完善。余所蒐集明刻本除上述数种外，尚十有余种，均以赵本为其母本。清刻本亦如是。

赵本有清光绪二年浙江书局校刻本，于文字有所改正，此为坊间最通行之本。故杨、赵及其他明刻，又另为一系统。

大抵勘校《管子》，在目前当以上述五本为不可或缺之底本，即宋杨忱本、刘绩《补注》本，朱东光“中都四子”本、十行无注古本及赵用贤“管韩合刻”本是也。

## （六）

《管子》书在汉初颇被重视，其后即遭闲却，以宋代为特甚。

宋代言《管子》者以张嶠《读管子》一文最见功力，其文虽不足四千字，而诂训精确，洞见闾奥。文中言“读者累月，始颇窥其义训。然舛脱甚众，其所未解尚十二三。用上下文义及参以经史刑政，颇为改正其讹谬。疑者

表而出之，其所未解者置之，不敢以意穿凿也。……将得善本而卒業焉”。杨忱本未即附张嶠此文，可知张所“改正”者杨必已照录，故杨本特精善，则张嶠可谓《管子》之功臣。

晁公武于《管子》书亦曾有所校释，其《郡斋读书志》云“因为正其文字而辨其音训”。晁氏作《读书志》即由校讐井宪孟藏书而成，其于《尹文子》云“谬误殆不可读，因为正其甚者”，于曾子云“文字谬误，乃以《大戴礼》参校之”。惜晁氏所校《管子》失传，其所是正之文字及所辨之音训已无可考见矣。

明人嗜好《管子》，但大抵重视其文藻，不脱高头讲章式之恶习，且喜为删节移易，而于校释之业甚疎。清人则偏重校释，如孙星衍、洪颐煊、王念孙、王引之、陈奂、丁士涵、张文虎、俞樾、戴望等，均各有专业，阐发特多。戴望著《管子校正》，曾将诸家业绩汇萃于一书，颇便读者。近年坊间铅印本，多于《管子》书后附印《管子校正》，诚为善举。戴望而后续作者尚不乏人，如孙诒让、何如璋、张佩纶、陶鸿庆、姚永概、刘师培、章炳麟等，其较著者也。

### (七)

日本学者猪饲彦博字文卿，所为《管子补正》刊行于“宽政十年”，即清嘉庆三年（公元一七九八年），较洪颐煊、王念孙诸氏著述之问世为早（注七），善能揭发疑窦而予以慎重解答。说解虽甚简略，而可取之处颇多。王氏父子及丁士涵之说每有与之不约而同者。以海外学者而能深入独到，殊觉难能可贵。（注八）

猪饲之后有安井衡字仲平者著《管子纂诂》，刊行于“元治元年”，即清同治三年（公元一八六四年），后于猪饲之书六十有六年。然猪饲之与安井其识见有上下床之别。安井书虽亦征引猪饲说，但仅其一小部分，且有拾芥遗珠之嫌。安井说多为戴望《管

子校正》所采录，足征《纂诂》一书早已输入中国。猪饲之《管子补正》是否为清代学者所曾见，则颇为疑问。

又安井衡《管子纂诂》后附有应宝时长序一篇（注九），署年为同治六年（公元一八六七年），官銜为“江苏苏淞太兵备道”。序中于《管子》书有所论列，以关于《侈靡篇》者为多，然其所言与俞樾说全同，有时甚且一字不异。考俞樾《诸子平议》始刻于同治六年，刻成于同治九年，问世较后，初颇致疑。其后考知应与俞同年成进士，且同籍浙江，而同治《上海县志》即同治五年应任兵备道时所“为之设局、延礼名贤、分门编纂”而成者，其总纂之一人即为俞樾。藉此可知，应、俞关系密切，俞书稿本当为应及其幕僚所曾见。应序中尚提及一人，谓“尝举以质同学生尹望德（子铭），再三商榷，似无以易之”，余疑尹或为应序之代笔者。是则剽窃俞说者，如非应宝时本人，则必为此“同学生”也。此一公案不可不为剖白，故附述之于此。

### (八)

《管子集校》为已故许维遹教授所着手纂集，原名《管子校释》。许氏以戴望《管子校正》为基础，而加以扩充。凡在戴望以后诸家校释为许氏所见及者均为抄录，戴望以前者亦间有补遗。原稿共十九册，约四十万字。稿本均经誊录，有三四人手笔。许氏所用方法与戴氏无多殊，臚列诸家校释后，时或以己见评鹭增损，亦有诸家未及而已见独到者，均以案语出之。唯于摘取原文标目时，则每依校释而逐加改窜，其不同处以注文明之，其增补处以方格限之，此为特异。

稿本三分之一业经闻一多教授参校，即自《牧民》至《幼官图》最初九篇及自《匡乘马》至《轻重己》最后十六篇。闻校于许所遗漏者均亲笔录入，字迹异常工整。闻亦时加案语，

对于许说亦每提出不同意见。自《匡乘马》以下十六篇又曾经孙毓棠氏参校，亦时有案语附列。凡经闻氏参校部分，别有正文录本，其文字业经校订，其意殆拟将正文与校释一并印行也。

稿本眉端，许氏复有所抄补。其所新增资料，凡有成书者则只记“某某人云”数字以待助手补抄，凡无成书者则亲笔入录。唯许氏似喜用破笔焦墨，字迹草率，颇难辨认。稿本系用中国普通土纸，保存状态不甚良好，有三四册颇为糜烂，甚至有一二叶糜烂至仅残存少许文字者。

许氏撰述计划，其斥已有改变，故对此项稿本似不甚重视。许氏另一计划系就《管子》原书全体施注，曾以光绪五年影刻宋杨忱本为底本而加以翦贴，以诸家校释及本人案语分注于有关辞句之下，但仅翦贴至《侈靡篇》首而许氏已于三年前逝世，全书尚未及半。

### (九)

许氏余所不识，闻氏生前则会两次见面，并曾有文字往还。二氏同系清华大学教授，二氏之合作，其时在抗日战争期间，其地在昆明。为物质条件所限，二氏所参考之书籍不多。以《管子》版本而言，除光绪五年影刻宋杨忱本外，陆贽校刘绩《补注》本、十行无注本、明刻朱东光“中都四子”本、明刻赵用贤“管韩合刻”本，均所未见。许所见赵本乃清刻浙江书局本耳。

此一物质限制，即清代学者亦未能免。博洽如王念孙，宋之杨本在所未见。又如戴望，其所著《管子校正》每引列“中立本”文字异同，却几乎全部错误。盖“中立本”即“中都四子”本，亦即朱东光本，中立乃府名，其故治在今安徽凤阳县东，明初设置，后改为凤阳府。明代定此地为“中都”，故又称中都。所谓“中都四子”者乃老子、庄子、管子、淮南子，以四子乡土在此区域，

故朱东光与张登云、郭相奎等集而为一丛刊。戴望所引“中立本”文字多与朱长春《管子榷》及朱养和花斋本符合，足证戴氏并未见“中都四子”本。戴氏误文在许氏两种遗稿中均照录而未校正。

诸家原书或未刊稿本及民国以来各种述作，许闻二氏亦多未及见，故其征录未能该遍，而其案语亦往往已为前人所道。纂述体例不甚严密，征引旧说漫无时代先后，因之说解之发展无从追寻，而孰为因袭，孰为雷同，亦无从辨别。标点符号甚不一致，如“某某人云”下原用双重引号（“ ”），而“某某案”下则无，因而文中引号便颇参差。又如人名、地名、书名，均无标识，如照样印行，读者将大感不便。征引群书而未经严密核对，稿中夺误，所在多有。

凡上所述乃原稿之面目及其缺陷。原稿乃一初步草案，离完成阶段甚远，加以整理，颇为困难。整理工夫曾经历两个阶段。第一步系就原稿之糜烂处加以整补，其征引旧说未录全文者加以补录，尽可能翻阅群书，核对原文，纠正错误，其标点符号之参差错乱者亦为之统一更正。经过第一阶段整理之后，原稿非重经誊录不可，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工作同志曾任此劳役。于是又进入第二阶段。誊录后之原稿，曾请许闻二氏旧友冯友兰、余冠英、孙毓棠、范宁、马汉麟诸氏分别校阅其一小部分，余复从而总校。

校阅时凡《侈靡篇》以前诸篇均曾参照许氏翦贴本。翦贴本之撰述较后，所引旧说有所补充或翦裁，后案亦多所修改或删削，凡此均改从翦贴本。翦贴本谈板本文字异同颇详，以此列为第一项，而《校释》稿本则甚略，绝大部分甚至一字未提。为求统一，必须增补。此事极琐碎，虽增加不少麻烦，然亦增加不少知识。为使此项工作能以完备，余曾广泛收集各种板本，并四处调阅各种稿本，北京、上海、武汉、长沙各地图书馆或专家学者均曾予以协助，而以北京图书馆之协助

为最多。此种物质条件为前人所不能具备者，非居今日殊不可得。于是第二阶段之整理乃费时更久。

凡在整理过程中，对《管子》原书不能不反复通读，于诸家校释亦不能不反复校量，故于原文疑难处之通晓亦得时有弋获。因此使整理后之稿本增至一百三十万字以上，比许闻原稿已增加三倍。

## (十)

整理工作费时凡十阅月，中因出国，曾中辍者两月，其余则大抵集中力量而为之。在工作中，如前所述，曾获得公私协助，当在此致谢。科学出版社及历史研究所第一所张德钧、任林圃同志、北京图书馆戚志芬同志，曾协助检阅群书，出力颇多。王廷芳同志曾为征集各种板本稿本，于技术工作上有所协助，如《幼官图》(玄宫图)之复原剪贴即出自王手。

此项工作，骤视之实觉冗赘，然欲研究中国古史，非先事资料之整理，即无从入手。《管子》书乃战国秦汉时代文字之总汇，其中多有关于哲学史、经济学说史之资料。道家者言、儒家者言、法家者言、名家者言、阴阳家者言、农家者言、轻重家者言，杂盛于一篮，而文字复舛误歧出，如不加以整理，则此大批资料听其作为化石而埋没，殊为可惜。前人已费去不少功力，多所校释，但复散见群书，如不为摘要汇集，读者亦难周览。有见及此，故不惜时力而为此冗赘之举。

此乃研究《管子》之初步工作，且此初步工作亦未尽善。如依闻氏计划，将经校《管子》正文与《集校》一并印行，此一法也。如依许氏计划，剪贴诸家校说，就《管子》全书施行注释，此又一法也。如此，似均于读者较便。闻法尚易为，许法则颇为费事，如有有志者愿足成其事，自亦有益。

然而整理古籍，汇集校释，非为一般读

者，乃以便于从事研究工作者之獭祭，则不附刊原文，不随文施注，当亦无妨于事。研究工作有如登山探险，披荆斩棘者纵尽全功，拾级登临者仍须自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知勤劳，焉能享受？关于《管子》全书之进一步研究，将尚有待。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注一)许国霖《敦煌杂录》收有北京图书馆藏敦煌残卷“羽字四〇号”“为政箴言(拟)”二则。其第一则为“审饰小经以示民，时言大事以动上，远交以越群，假爵以临朝，明主之禁也”。其第二则为“野无吏则无畜积，官无常则下汕上，器械不治则朝无定，赏罚不明则薄其产”。下书“天复二年写生索奇记”。天复乃唐昭宗年号，二年为公元九〇二年，距今一〇五二年前。此二则均出《管子》。第一则出《法禁篇》，杨忱本“经”作“节”，“越”作“踰”，“临朝”下有“者”字。第二则出《兵法篇》，杨忱本此处适缺，后补。兹据刘绩本检校，“汕”作“怨”、“治”作“巧”，“薄”作“轻”(参看插图第一)。许国霖拟为“为政箴言”，实误。《管子》文见此钞录，至可宝贵。又“治”字原文颇异，疑是“治”字之误。又《鸣沙石室佚书》有唐人写本敦煌残卷北齐《修文殿御览》引《管子·霸形篇》文，乃节录，详见本书该篇。

(注二)《大匡篇》“兄与我齐国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济，是吾义也”。尹注“召忽称管仲为兄。‘与我齐国之政’谓使知政也。今受君令而立子纠，不改所奉，更有所立。不济而死，是为臣之义也”。别本注“虽许我齐国之政，然受君令而立子纠，若不济，以死继之，是为臣之义”。二注大相悬殊。

(注三)《地员篇》“赤壤罄山十七施”。刘绩《补注》云“绩按：罄(原误作施)，吾高切，《广韵》俊健也”。考《广韵》乃宋代依《切韵》、《集韵》、《唐韵》等所纂修，刊行于宋景德四年，大中祥符元年定名为“大宋重修广韵”。刘既引及《广韵》，则说刘为辽圣宗时人似有问题。然查《广韵》，并无“罄，吾高切，俊健也”之文。辽人《龙龕手鑑》卷三力部“罄音毫，俊健也”。音义与此同。《龙龕手鑑》成书于辽统和十五年，宋太宗至道三年(九九七年)，

(下转第60页)

## 校 毕 书 后

本书之增订，计自一九五三年十一月接受许闻初稿加以整理，至今二校校毕为止，费时整整二年。行有余力，大抵集中于此。用力颇多，但所获成果殊难令人满意。

许闻旧稿仅属草创，严格言之，离成书阶段甚远。为之补苴罅漏，已超过原有字数数倍。但为体例所限，一律以许闻案语录后，以增补之说录前，因而许闻之说不能照顾全面，且复时有雷同。虽已略为删芟，然以处理他人遗稿，终不能任所欲为。此难令人满意者一也。

许闻旧稿引列《管子》辞句标目，依已裁断，每已窜改原文，而以小注标示异同。但其所见未广，裁断多欠斟酌处。本书既已增引别家意见或自立新案，于许闻裁断有所平反，而标目却不能不仍许闻之旧，因而眉目不清，易生淆乱。且全文既有标点，而标目文字独无，未能画一。此难令人满意者二也。

旧稿成于辗转纂集，且录于助理者之手，错误甚多。如戴望《管子校正》既纂录他书，旧稿复转抄戴著，因而以讹传讹，戴著之误更多未能厘正。进行增订虽已尽力覆检母本，但亦苦难周匝，违失之处，更改当有未尽。且纠举违失时，其过甚者每不能不加以说明，因而更不免有“诿以为直”之嫌。此难令人满意者三也。

纂录既出自数人之手，期日之相悬复在二十年以上。杂纂成书，选择与裁断之标准不一。且孰系旧稿原有，孰系出于增补，读者不易了了，因而纂录者之责任有欠分明。歿者之错误如未能为之补正，存者当负其责，而存者所新增之错误则因责可旁贷，将不免玷及歿者焉。此难令人满意者四也。

整理之方，初未详加考虑，颇自悔其孟浪。盖策之上者，应将许闻原稿照样印行，再别为增补以匡其违失。如此，则责任分明，而体例亦不致淆乱。然今已无可如何矣。

本书如上所述，虽有种种疵病，然于历来《管子》校勘工作，已为之作一初步总结。此一工作，于今后有志研究《管子》者，当不无裨补。此书之作，专为供研究者参考之用耳。使用此书时或不免有庞然淆杂之感，然如耐心读之，披沙可以拣金，较之自行渔猎，獭祭群书，省时撙力多多矣。

至余整理此书，亦复时有弋获。《管子》一书乃战国秦汉文字总汇，秦汉之际诸家学说尤多汇集于此。例如《明法篇》乃韩非后学所为，《水地篇》成于西楚霸王时，《侈靡篇》乃吕后称制时作品，《轻重》诸篇成于汉文景之世，皆确凿有据。故欲研究秦汉之际之学说思想，《管子》实为一重要源泉。余久有意加以彻底研究，而文字奥衍，简篇淆乱，苦难理解。今得此机会，能将原书反复通读，凿通浑沌，已为此后研究奠定基础。二年之光阴，亦非纯然虚费也。

本书二校校样，余曾通体校阅一遍，复有所增补删改。曩时助理者任君林圃因病已回济南，张君德钧继之，分任校政，增补文字亦颇多。杨遇夫先生亦曾校阅一部分，有所揭发，其说已为录入。

书中采及明抄本《册府元龟》，乃青岛劳山华严寺藏书，去年七月下旬在青岛渡休假期时，因张公制先生之介绍，得以借阅。该书中所引《管子》，文字与现存《管子书》宋明刻本时有不同，而较为优胜，盖所据乃唐人写本，与宋明刻本之母本有别，故能局部存真也。惜其书已残，所可利用之处有限耳。

本书之成，多得各地友好及各机构之协助，卷首《叙录》中已叙及。兹于二校校毕，谨在此再深致谢意。

郭沫若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上接第58页）在《广韵》成书定名之前。刘绩《补注》之“广韵”当为《唐韵》之误。《龙龕手鑑》亦根据《唐韵》立说者也。

（注四）刘绩本所用简笔字（避讳者除外），据余初步统计，有五十四字之多。如以余为餘，以谷为穀，以尤为犹，以未为味，號省作号，纒省作余，聾省作声，遷省作迁，攝省作搦，聽省作听等所在皆是。正规书用简笔字如此多，实所罕见。

（注五）详见本书附录任林圃辑“刘绩《管子补注》本中所见辽金宋讳考”。

（注六）此书之存在，蒙叶玉华同志提示，并蒙“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寄阅，俾得解决一重要公案，特此志谢。安正书堂本经借阅后，余曾题记其上，认为重刊本木牌墨记价值连城，自信语非誇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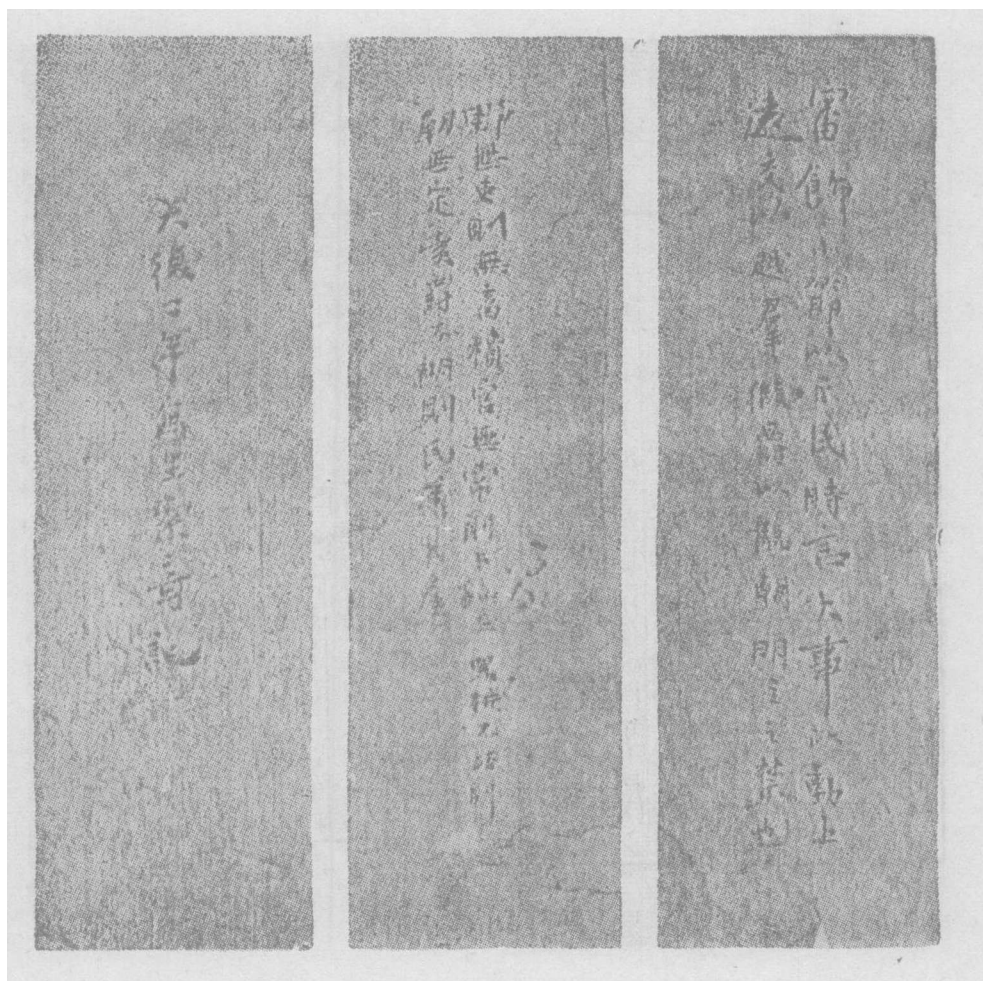
（注七）洪颐煊《管子义证》刻成于嘉庆十七年（公元一八一二年）。王念孙《读书杂志》脱稿于道光

十年（公元一八三〇年），开刻尚在其后。

（注八）猪饲为日本近江（今为滋贺县）人，别号敬所。余近得其《论孟考文》、《读礼四考》、《太史公律、历、天官三书管窥》等著，颇有创见。第三种书中引及钱大昕说。日人称其年八十有八，耳目失灵，犹勤学不倦云。

（注九）应宝时序当为安井衡所求，序中云“安井君字仲平者……撰《管子纂诂》以向贻来喆，介其国昌平学儒员中村君以书相示。……故乐为之序”。序至日本在书刻成之后，安井并未重视，仅以附于书末。其自序云“庚午（同治九年）正月清人应宝时《纂诂》之序传自上海”，并云“应序所论取其是而驳其非又十有八”，于应直书姓名而无若何之敬称，足征安井为入之倨傲。又于应序“以向贻来喆”句加一眉批云“向字当在喆下”，适足表曝安井之浅陋，所谓妄作解人者也。





插圖第一

管子唐抄殘文

北京圖書館攝影，原卷

藏北京圖書館。



插圖第三

管子十行無注古本與安正書堂重刊本之比較(二)

甲、無注古本缺字待刻處呈墨印。

乙、安正書堂重刊本缺字待刻處削去，均呈空白。

(甲)

<p>以春日始穀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子祀於          大宗其盛以麥麥者穀之始也宗者族之始也同族          人殊族者處皆齊大材出祭主母天子之所以主始而          祀也</p>	<p>以夏日至始穀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祀          於太祖其盛以黍黍者殺之美者也祖者國之重者也          大功者太祖小功者小祖無功者無祖無功者皆撰其          位而立沃有功者觀於外祖者所以功祭也非所以成          祭也天子之所以異貴賤而賞有功也</p>	<p>祀於太祖西出其國日二十八里而壇服白而純白擗          玉幣帶錫監吹笙擊風鑿動金石音勿諸侯卿大          夫列士備於百姓號曰祭月犧牲以祀祭就出令曰          勿勿實春而勿子罪微誅而勿生終歲以罪毋有所赦          作行牛馬之幣其在野者王天子之秋計也</p>
<p>以秋日至始穀四十六日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統黑          而靜廣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備於百姓號就出令曰毋          行大夫毋斬大山毋塞大水毋犯天之降天子之冬禁          也</p>	<p>以秋日至始穀九十二日天子北出九十二里而壇服          也</p>	

(乙)

<p>以春日始穀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子祀於          大宗其盛以麥麥者穀之始也宗者族之始也同族          人殊族者處皆齊大材出祭主母天子之所以主始而          祀也</p>	<p>以夏日至始穀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祀          於太祖其盛以黍黍者殺之美者也祖者國之重者也          大功者太祖小功者小祖無功者無祖無功者皆撰其          位而立沃有功者觀於外祖者所以功祭也非所以成          祭也天子之所以異貴賤而賞有功也</p>	<p>祀於太祖西出其國日二十八里而壇服白而純白擗          玉幣帶錫監吹笙擊風鑿動金石音勿諸侯卿大          夫列士備於百姓號曰祭月犧牲以祀祭就出令曰          勿勿實春而勿子罪微誅而勿生終歲以罪毋有所赦          作行牛馬之幣其在野者王天子之秋計也</p>
<p>以秋日至始穀四十六日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統黑          而靜廣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備於百姓號就出令曰毋          行大夫毋斬大山毋塞大水毋犯天之降天子之冬禁          也</p>	<p>以秋日至始穀九十二日天子北出九十二里而壇服          也</p>	

插圖第四

許維適、聞「多原稿經補訂後之一頁  
初稿原經繕寫，詳、間有所添改，郭校又有所添改。

守之守也

張佩綸云：「大准」均當作「失准」。  
臣之能謀屬國定民者民本作名

屬國初則重之反實先  
屬國初則重之反實先  
屬國初則重之反實先

用勸相我國家」

張佩綸云：「勸」勉力也。考立政

一多案：屬與勸通  
君之民非國富也鄰國富之  
張佩綸云：「非」非也。非者對

非佩綸說同

失准之數也作大  
張佩綸云：「當作輕重失准之數」

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

張佩綸云：「幣重三分」當作「穀之輕重一分」，「財物

民之相明

之輕重三分」承上來」  
此輕重之失准也作大

守之守也

藉之於衡

張佩綸云：「衡」即通塞變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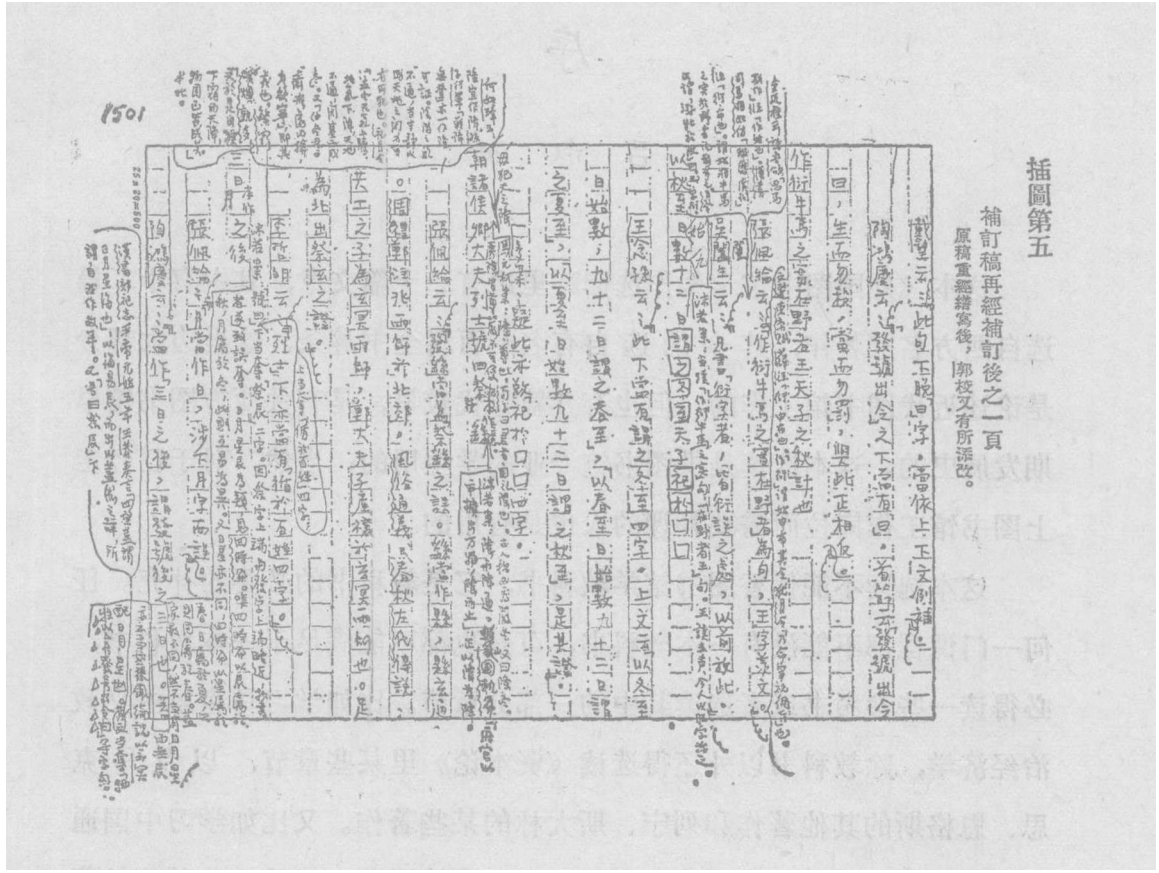
以利相守則數歸於君矣此謂國衡

若守其法則民失其守也  
「國衡」即「國衡」之誤。其本字「國衡」。

「國衡」即「國衡」之誤。其本字「國衡」。

插圖第五

補訂稿再經補訂後之一頁  
原稿重經繕寫後，那校又有所添改。



• 今年6月是郭沫若同志逝世10周年。郭老博大精深，于学无所不究。他对图书馆、图书馆事业十分关怀重视，倍加爱护，1959年秋他为《图书馆学通讯》的题诗人所共知。《管子集校》是他长期利用图书馆，并获得图书馆服务“而以北京图书馆协助为最多”的从事科学研究，整理辑校成果典范之一。书中指出的“研究工作有如登山探险，披荆斩棘者纵尽全功，拾级登临者仍须自步”等语表明了他对图书资料工作和研究工作的深刻理解和严谨治学之风。特选刊《管子集校》叙录和校毕书后全文发表，以资纪念。

—编者

## S U M M A R Y

### Ren Jiyu on Liberating the Productive Forces

Director of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Ren Jiyu said that the documents of the 13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re abundant in good experience which have set free people's mind and consequently will further liberate the productive forces. It is the same with our Library. Through careful study of the said documents we can try to find out where in our Library the Liberation is not sufficient and what the barriers to productive forces are. Some of our ways contradict the delivery of such forces. For instance, whether the appraisal of vocational titles is strict to standards is a matter worthy of consideration. Ideological problems need to be solved, but practical problems also need to be solved. Do not have these two kinds of problems mixed up. If one or two practical problems could be solved each year, the prestig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will be enhanced.

excerpts of a speech made at a meeting of the Library's leading cadres. (page 13)

### Introducing the mural "Magnificent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Stepping into the entrance hall of New Building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one may face a ceramic bas-relief mural composed of seven parts. This mural gives just the finishing touch to the "City of Books."

The special environment of a national library offers the mural its appropriate theme of the long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is mural contains myths of remote times, historic figures or legendary tales as well as cultural relics. Its ancient designs merged with the architecture's own style. Artistic deformation treatment are given to patterns on ancient ceramic bronze wares and portraits. persons of different ages who are symbolic of, or imply the "library" are depicted. The mural has truly paid warm tribute to the magnificent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page 20)

### *Preface to "Collation of Texts by Guan Zhong"*

Works of Guan Zhong are known to be difficult reading. Having undergone the long lapse of ages, the original copies are no more available. What remained are random pieces with various errors. Guan Zhong's texts are in fact a gathering of writings of the Warring States (B.C. 475-221), the Qin Dynasty (B.C. 221-207) and the Han Dynasty (B.C. 206-A.D. 220). While the texts included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and the history of economics, considerable part dealt with the sayings of various schools as that of the Taoist school, the Confucian school, the Legalist school, Logician school, the school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Forces, school of Agriculture, etc. Various types of errors unavoidably followed the miscellany of contents. If not to be processed, this large quantity of source material would



have been overlooked and come to naught. Our predecessors have done a great deal along the line of collation, commentary notes and explanation of words, which are regretfully very widely scattered in books.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readers, colossal effort is needed to select and to compile into one compendium.

With the purpose to further improve these valuable texts, eminent scholar Guo Mojo had collected several versions of such texts and read manuscripts from different sources "in order to offer some processed source material to researchers." He maintained that "Doing research is like mountain-climbing, even though the forerunners had done their best to open up the way, the posterity has always to ascend by oneself." (page 53)

*Precis of "Selected Readings from Foreign  
Works of Library Science"*

This book is on the State Education Commission 1985-1990 plan for textbooks. Having comprised entries selected from encyclopedia of Great Britain, France, United States, and Soviet Union, as well as works of known scholars of library science over the past eras, this book thus well outlined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ibrary and library science. It also offers biographical sketches of some representative persons in the library world, and lists in its appendix the major events of library science in different countries on the world scene. On the whole, the book gives both a theoretic and a historic sketch. It is a reference book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specialize o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a book for libraries of different levels. (edited by Yuan Yongqiu and Li Jiaqiao, preface by prof. Lu shuxiang; published by Beijing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 distributed by Xinhua Bookstore) (page 66)

*Dr. Tsuen-hsuei Tsien and his  
"Paper and printing"*

Dr. Tsuen-hsuei Tsien is a well-known scholar and author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His prestigious work "Paper and printing" has been admitted into the First Part of the Fifth Volume (published 1983) of "History of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r. Joseph Needham wrote in the preface to his "History of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r. Tsuen-hsuei Tsien is one of the world's most eminent authorities on this subject" And it was thus comme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book offered us thorough facts while giving explicit statement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methods, environment and influence of a form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by mankind that survived the longest duration. In China, the book was lauded as "the best among books of this calibre" In this issue of Bulletin of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the editor has published the interview by a reporter of "Huasheng News" which delineated the great contribution the author made in magnifying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page 72)